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当代中国东方哲学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ORIENTAL PHILOSOPHY IN CHINA

孙晶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当代中国东方哲学研究

CONTEMPORARY STUDIES OF ORIENTAL PHILOSOPHY IN CHINA

孙晶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东方哲学研究 / 孙晶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161-5896-8

I. ①当… II. ①孙… III. ①东方哲学—哲学研究
IV. ①B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968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副主任 蔡 昉(常务) 李培林 李 扬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 援	王国刚	王建朗	王 巍
邢广程	刘丹青	杨 光	李 平	李汉林
李向阳	李 林	李 周	李培林	李 薇
吴恩远	张宇燕	张顺洪	陆建德	陈众议
陈泽宪	卓新平	周 弘	郑秉文	房 宁
赵剑英	郝时远	唐绪军	黄 平	黄群慧
朝戈金	程恩富	谢地坤	蔡 昉	裴长洪
潘家华				

总策划 赵剑英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变动之中，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改革开放的攻坚期。这一切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目前面对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素材。二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实施，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了良好环境。

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这一号召，启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旨在努力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学术观点与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组织与管理创新、科研方法与手段创新、用人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创新。实施创新工程的目的是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不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精品成果，多出政治方向正确、学术导向明确、科研成果突出的高层次人才，为人民服务，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实施创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学科建设机制，优化学科结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结构合理、优势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学科布局。作为创新工程精品成果的展示平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报告的撰写，对于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状况、积极推进学科建设和创新来说，是一项兼具基础性和长远性的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处在形成和发展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不断拓展与深化，成就显著、举世瞩目。为了促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方法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扩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增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我们亟待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思想的发展轨迹，不断总结各学科积累的优秀成果，包括重大学术观点的提出及影响、重要学术流派的形成与演变、重要学术著作与文献的撰著与出版、重要学术代表人物的涌现与成长等。为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编撰“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大型连续出版丛书，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分为三个子系列：“当代中国学术史”、“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和“学科年度综述”。“当代中国学术史”涉及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语言学等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内容丰富，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状况。“学科前沿研究报告”按一级学科分类，每三年发布，“学科年度综述”为内部出版物。“学科前沿研究报告”内容包括学科发展的总体状况，三年来国内外学科前沿动态、最新理论观点与方法、重大理论创新与热点问题，国内外学科前沿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学科年度综述”内容包括本年度国内外学科发展最新动态、重要理论观点与方法、热点问题，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每部学科发展报告都应当是反映当代重要学科学术思想发展、演变脉络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性成果；都应当是作者长期以来对学科跟踪研究的辛勤结晶；都应当反映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引领学科发展方向。我们相信，该出版工程的实施必将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该系列丛书也将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史料文献和教学材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学事业以及人才培养作出重要贡献。

导 论

关于东方、东方学——中国对印度哲学的研究——日本对印度和中国哲学的研究——西方对东方哲学的研究——东方宗教哲学的起源——东方哲学内部的可比性——东西方文化的比较

东方既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也是文化及政治概念。如果单讲东方（east）这个地理学的概念，那它包括了整个亚洲以及北部非洲，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的东亚地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南亚地区；包括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埃及等国的西亚北非地区；包括越南、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东南亚地区。这是相对于西方（west）的地理概念而言的。作为一个地域概念，它的形成也有着历史的原因。不同国度的人对“东方”这个地理概念有不同的地域所指。美国人说“东方”指的是远东（亦即中国和日本）。而法国人与英国人从历史上来看，他们讲的“东方”主要指近东或阿拉伯世界，或与欧洲接界的“非欧世界”（non-European world）。而对于德国人、俄罗斯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以及瑞士人而言，“东方”指的又是另外一些地区。东方学权威萨义德认为，从18世纪以来，随着欧洲对世界“开发”范围的扩大，“东方”这个地理概念从原来的伊斯兰世界和近东，转化成相当开放的地理概念体系（包括印度、中国、日本等），使“东方”超脱了古代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范畴。^① 东洋

^① 参见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一词在我国元明之后的地理学著作中（《岛夷志略》、^①《东西洋考》^②）主要指南海东部地区，包括现东南亚地区。自清代以来又将日本称为“东瀛”或“东洋”。从政治上讲，16—17世纪以来，欧洲殖民主义向外扩张，为了与作为宗主国的西方国家相区别，即把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次大陆以及西亚北非地区通称为东方。日本人过去将印度、中国、日本这三国称为“东洋”，进而又将朝鲜、中亚纳入东洋的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西方对伊斯兰文化圈和犹太教文化圈开始重视，二者也被纳入东洋文化圈的范围。^③

西方国家不但从政治上、经济上奴役、压迫和掠夺东方地区的国家，并且在文化上以“欧洲中心论”来对东方地区各民族文化进行歪曲和摧残。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东方人民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为了抵抗和反抗这种压迫，逐渐开始形成东方民族主义运动，到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高潮。这种反抗思想反映在许多革命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如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所作的《大亚洲主义》演讲中，曾把东方文化说成是主张仁义道德的王道文化，把西方的功利和强权文化说成是霸道文化。列宁在他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也提到了“东方各民族”的解放问题。印度的甘地主义和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便是典型的东方形式。^④由于东方这个概念也代表着不同于西方的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所以在本书中特指包括中国（及东亚国家）、印度（及南亚国家）和巴比伦（及西亚北非国家）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些东方国家中，其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比较接近西方的是伊斯兰文化圈，而汉字文化圈和印度的民族文化则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形态。

东方学（Orientalism）是研究东方的历史、宗教、哲学、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及其他物质、精神文化的综合性学科。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以及以后发表的诸多文章中，多处专门论述什么是“东方学”（东方主义）。在萨义德看来，Orientalism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研究学科，即“东方学”。第二种是一种思维方式，由此，国内一些学者主张

①（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明代福建漳州人张燮（1574—1640）著。他还著有《文集》。

③参见〔日〕中村元《印度人的思维方法》，《中村元选集》第一卷，春秋社1988年版，第4页。

④参见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总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翻译成“东方主义”。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奠基于“the Orient”（东方）与“the Occident”（西方）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由此，大量的作家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精心阐释东方，包括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的出发点。第三种是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阐释方式，只不过其阐释的对象正好是东方、东方的文化、民族和地域”。这种阐释“归根到底是一种强加于东方之上的政治学说”。^① 根据第一种含义，东方哲学研究既可归属于它，同时也涵括了第二种含义。对东方哲学的研究是伴随着东方学的出现而诞生的。

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大约从16世纪末开始就有一些欧洲商人、传教士和其他最初到东方传教、贸易和探险的人员写了一些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早在13世纪就有马可·波罗（1254—1324）写的《东方闻见录》，^② 后来的门多萨关于中国的记载（1585）^③、欧利里阿斯关于波斯的记载（1647）等。16世纪末巴黎大学、17世纪牛津大学都开设近东语言课程。牛津大学首任阿拉伯语教授爱德华·波考克（1604—1691）著《阿拉伯史纲》，开阿拉伯研究先河。17世纪末欧洲一些大学收集了大量东方典籍文稿，出版了一批根据东方资料编成的系统著作。如戴尔倍罗等人编订的《东方文库》等。18世纪东方语言学获得了发展，东方经典的准确译本出版：加兰译《一千零一夜》、雷孝思译《易经》、^④ 乔治·赛尔译《古兰经》、杜柏农译印度的《奥义书》和波斯的《阿维斯陀》（又译为《波斯古经》）、哈尔赫德译《摩奴法典》。19世纪是东方学的确立时期。在前一阶段东方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东方学研究的众多方面

① 参见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总序，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 《东方闻见录》又称《马可·波罗游记》，共分4卷，共229章。（根据冯承钧中译本）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后，1296年因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被俘入狱，在狱中口述东方见闻，由同狱的比萨人 Rusticiano 笔录成书。据说原文是用古老的法语写成的。后来的版本、译本非常多。

③ Gonzalez de Mendoza，西班牙传教士，著《大中华帝国史》（英译名：*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China*）。

④ 最早把《易经》意译成西文的是耶稣会士雷孝思（1663—1738）译成的拉丁文本，共上、下两册，分别于1834年和1839年出版。《易经》日文版本是星野恒和伊藤东涯编的《汉文大系》第16辑，1913年出版。

都有突破和发展。系列考古发现和东方古代铭文的解读，是东方学确立的基础之一。格罗特芬德对波斯楔形文字的破译（1802），罗林逊对亚述、巴比伦楔形文字的解读，高波利翁对埃及象形文字的发现（1822）以及多次对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小亚细亚、印度、中国考古都取得了成果。东方语言学发展成熟，大型东方语言辞典、自成系统的语法著作陆续出版。如《英华字典》（6卷）^①、《梵文字典》（7卷）^②、《阿英词典》（8卷）、《中俄大辞典》及《梵文文法》^③、《汉文典》^④等。20世纪以来，东方国家的一批学者加入东方学的研究队伍，以不同于西方东方学界的民族视野研究东方学，以其材料充实的研究成果而异军突起。一些研究领域呈现出繁荣局面。如敦煌学研究成为国际性的热门。汉学、中东学、日本学由于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成为显赫之学。沙畹（1865—1918）的汉学著作、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汉密尔顿·吉布的《阿拉伯文学史》、瓦特的《穆罕默德：先知和政治家》、陶德的《拉贾斯坦编年史与文物》、温特尼兹的《印度文学史》、谢尔巴茨基的《印度逻辑》等都是东方学的重要论著。东方学家的国际性合作研究是20世纪东方学的新发展。如《伊斯兰百科全书》就是西方各国伊斯兰—阿拉伯学者通力合作的产物，1942年出版了4卷本，然后各自根据已取得的学术成果进行专题研究，提供基本书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编写的3卷中大部分词条是专门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1954年又在英、法、德学者的主持下修订，自1960年陆续出版各卷，汇集了20世纪世界阿拉伯研究的成果。

关于东方哲学，一开始欧洲人是不承认东方有哲学存在的。在德国，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曾认为欧洲之外没有哲学，尽管有着“深邃的智慧”，但至少没有“专门的哲学”。黑格尔认为孔子和他的弟子

① 《英华字典》（或称《中英字典》、《中国语言字典》、《华英辞典》等），是世界第一部英汉一汉英对照字典和中国境内最早使用西方活字印刷术排印的第一部中文书籍。该字典由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独立编著，由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印制。共6册，在澳门出版，于1815年至1823年陆续出版。

② 《梵文字典》（*Sanskrit Wörterbuch*）由著名语言学者伯特苓克（Boeht-lingk）著，其同时著有《简帛梵文字典》（*Sanskrit Wörterbuch in Kurzer Fassung*），1889年出版。

③ [法] R. Antoine 著，梅迺文译。

④ [瑞典] 高本汉著，潘悟云等编译。

们的谈话（即《论语》），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道德常识，这种道德常识在哪里或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都能找得到。因此，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道德的教诲，从里面我们找不到思辨的东西。康德、黑格尔这种否定性评判的产生是源于他们东方知识的缺乏，非欧洲文化，从走进欧洲学者的眼中到得到欧洲学者的认可，经历了一段很长的历史。但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从1819年开始，尤其在1825年以后修正了他对东方哲学的看法。1819年，他在自己关于哲学史的演讲中，写进了“东方哲学”这一节。从1825年开始，他似乎修正了自己的评价，这主要是读了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的《论印度哲学》（载《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学报》），还读了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25年和1826年提交给柏林科学学院的对《薄伽梵歌》的评注。科尔布鲁克对印度哲学派别数论和正理一胜论学说的“摘录”，使黑格尔承认它们是“真正的哲学著作”。

二

中国的东方学研究起步很早，并在同亚非人民长期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古来有法显、玄奘和义净巡游印度，著有《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著作；杜环出使西亚北非，著有《经行记》。这些著作都是研究古代印度和近东的重要资料。元代汪大渊两次游历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著有《岛夷志略》。明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的20多个国家，其随员马欢、费信和巩珍分别撰写《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是研究亚非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资料。官修《二十四史》中不乏亚非地区或某一国家的专门记载。

中国和印度同属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在文化上自古就有交流。中国与印度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宗教、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两汉以后交流越来越频繁，唐代时达到高潮。一般认为，自公元1世纪佛教自西域传入中国开始，印度文化也就随之而入。在汉译佛经中包含了大量有关印度

哲学的史料^①，印度佛教思想是中国佛教的思想来源。然而，对印度哲学的研究与对佛教的研究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佛教学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佛教教义学，其研究是以宗教研究为核心的；而对印度哲学的研究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以研究印度古典文献为重点。在印度，自古以来学人们在学习哲学或宗教的相关经典时，不但要准确地理解经典著作的思想精髓，还必须进行实践，即所谓的“学道”。然而，自欧洲人侵入印度以来，为了更好地殖民化，他们对印度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究。欧洲人根据自身的哲学理性传统，抛弃了印度文化中实践的部分，以研究古典文献为主。这种研究方法很快就影响到了亚洲，主要是日本。例如，日本最早对《瑜伽经》进行研究时，就是将其作为哲学文献来研究，而不是作为一种宗教实践来研究。但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前期，一般都把印度哲学的研究作为佛教学研究的辅助性学问，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才改变了印度哲学研究的地位，取得了与佛教学研究相同的地位。

1. 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传入主要通过四个途径

(1) 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的南部海岸出发，经马来半岛，到中国的广州和泉州。此条路线被在泉州大量出土的印度教的历史文物所证实。前些年在泉州出土有200多件文物，包括印度教的主要神的石像，如：湿婆、毗湿奴、黑天、吉祥天女、罗摩等，以及用古泰米尔文写作的印度教的碑铭。

(2) 从印度的阿萨姆（古称伽没洛国）出发，经上缅甸到中国的云南及西南地区。此路线可由在云南大理发现的印度密教遗址，以及云南剑川县的石钟山石窟造像得到证实。

(3) 丝绸之路。从克什米尔，越葱岭，沿天山山脉南北两路，到达阳关和玉门关。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在丝绸之路有许多印度教的艺术品，如在敦煌有印度教的象头神画像（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在克孜尔有《罗摩衍那》助弥猴的本生壁画（克孜尔石窟第179窟）。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7世纪时在现新疆和田地区（古称瞿萨旦那国）有涂灰外道（即湿婆派）在活动^②，在新疆的库车城（古称屈支国，

① 参见汤用彤《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5页。

即龟兹)曾建有印度教的寺庙。^①

(4) 由印度经尼泊尔传入西藏。这是印度佛教和密教传入藏地的途径,也同样是西藏喇嘛教传入尼泊尔和南亚地区的通道。^②

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经过与中华文明的融合和互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浩瀚的文献典籍,形成了内容极为丰富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历史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 佛教在中国发展史的简单回顾

(1)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佛教初传入,虽然有了佛经的翻译,也有印度和中亚西域的僧人,但毕竟是初期阶段,还未能普及于民间。当时也没有正式的中华僧人,主要流行在宫廷贵族的上层社会。

(2) 魏晋时期(220—420),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译经方面,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义理学说方面,魏晋时期的佛教开始了“中国化”过程,除了译经之外,也从事佛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义学高僧”,如:道安、慧远、法显、道生、僧肇等。当时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佛经目录《经录》,《般若》之学盛行,同时还深受中国玄学的影响。曹魏之后,中国佛教建立了传戒制度,出家僧人不再只是“剃发”“染衣”,而是要“受具”。^③有了中国的僧人,这才标志着佛教真正在中国生根。

(3) 南北朝时期(420—589),由于得到了王朝的支持,佛教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南方,由于宋、齐、梁、陈四朝的统治者都热衷于佛教,发展很顺利,崇尚“义学”。在北方,佛教虽受“二武法难”^④,但佛教的发展并未受多大的影响,主要流行重实践的“禅学”。这一时期主要的成就有:梁僧祐的15卷的《出三藏记集》,为迄今保存完整的早期《经录》;僧祐的14卷的《弘明集》,是一部相当重要的佛教文献汇编;梁慧皎的14卷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体系完备的僧传。

①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今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② 以上四条输入路由黄心川整理提出,参阅黄心川为江亦丽《商羯罗》一书所作的序,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2—9页。黄心川:《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载《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南亚研究》增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③ 受了“具足戒”,方能成为正式的合格僧人。

④ 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

(4) 隋唐时期(581—907),这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因为,随着中国的统一,佛教也走向了统一。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各个佛教宗派相继产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各宗的佛教大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佛教领袖人物。如法相宗的玄奘、窥基、慧沼;华严宗的法顺、智俨、澄观;禅宗的道信、弘忍;等等。

(5) 宋元及以后时期(960—),直到明清,佛教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各派各宗仍然各自为政,分头活动,但大都是在步前人后尘,很少有新的理论提出。明朝皇帝推崇理学,且为了维护自己政权的稳定,防止佛教组织成为民众闹事的工具对佛教加以严格的控制。清朝则在继续控制佛教的同时,对喇嘛教加以扶持。

关于印度佛教和哲学对中国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明白:

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这几百年中间,是印度哲学在中国最盛的时代。印度的经典,次第输入中国。印度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名学、宗教哲学,都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光彩。此时凡是第一流的中国思想家,如智俨、玄奘、宗密、窥基,多用全副精力,发挥印度哲学。那时的中国系的学者,如王通、韩愈、李翱诸人,全是第二流以下的人物。他们所有的学说,浮泛之浅陋,全无精辟独到的见解。故这个时期的哲学,完全以印度系为主体。唐以后,印度哲学已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时期是仔细咀嚼的时候。唐以后便是胃里消化的时候了。吃的东西消化时,与人身本有的种种质料结合,别成一些新质料。印度哲学在中国,到了消化的时代,与中国固有的思想结合,所发生的新质料,便是中国近世的哲学。我这话初听了好像近于武断。平心而论,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①

从印度佛教来讲,分有小乘、大乘两大系统,这两种系统都传到了中国。但是,这两大系统传到中国以后,经过在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

^①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7页。

展，也在逐渐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后，形成了自隋唐以来的“大乘八宗”（即天台、三论、唯识、华严、禅、净土、律、密）。自此大乘佛教在中国独霸天下。

佛教自进入中国以来，一直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思想理论上与儒家、道家既互相吸取，又相互矛盾。然而在长期的相互交涉中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甚至可以说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印度佛教在哲学思想方面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所接受，程朱理学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对佛学赞不绝口，如“释氏之学，亦极尽乎高深”（《二程全书》卷十三），“（庄）周安得比他佛！佛说直有高妙处，庄周气象，大都浅近”（《二程全书》卷三十七）。明代儒学家王阳明的哲学命题“天下无心外之物”，与佛教唯识宗的“心外无物”的命题完全相似。至于道教，可以认为无论是宗教形式、道观规模或道士形象都对佛教进行了模仿。而佛教传到中国后，在汉代它被方术化；到魏晋，它又玄学化；此后再受儒家的影响，如“儒佛合一”，“三教同源”。儒、释、道三教在中国一直是相互融合、相互吸收的。

3. 中国还保存有大批的印度的史料和文献

（1）婆罗门教—印度教梵文文献：《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莲花往世书》（*Padma - pūraṇa*）、《数论颂》（*Sāmkhya - kārikā*）、《七句义论》（*Saptapadārthī*）、《胜宗十句义论》（*Daśapadārtha - śāstra*）、《波你尼经读本》（*Pāṇinisūtrapāṭhaka*），等等。其中，中国陈隋之际的真谛（约 548—596）所译印度自在黑（*Śvarakṣṇa*）的《金七十论》（*Suvarṇasaptati - Śāstra*）在印度已经失传，后根据《金七十论》又将它倒译为梵文。^①《胜宗十句义论》是由玄奘将其译成汉文，现在印度已无此梵本。上述梵文经典大都是 11 世纪以后的写本。在西藏布达拉宫（起居驻）发现的梵文写本《摩诃婆罗多》、《莲花往世书》、《胜宗十句义论》等三种都是用“驴唇体”（俱卢梵语 *kharoṣṭhi*）所书写，在我国新疆还发现了一些用“驴唇体”写作的梵文医学类写本。

（2）佛教经典：据统计，现存汉译佛经和其他经典中属印度次大陆的共计 1692 种，约 5700 卷。根据 1683 年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统计，属于

^① 此书由高楠顺次郎先转译为法文，再由 N. A. Sastri 译为梵文，即 *SuvarNasaptati ZAstra*, 1944 年在印度出版。

正藏（甘珠尔）的计 1055 部，属于副藏（丹珠尔）的计 3522 部。这些经典极大部分由梵文翻译而来。佛教经典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印度教密教的经典，例如：日本所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18 册至第 21 册密教部共收录经轨 1420 部，其中属于密部的经轨计 573 部。另外，在藏外还发现有密教经典 60 部。^①

在佛教的经典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印度别的宗教哲学的资料，这从近年中国出版的汤用彤的著作《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中就可以看出。该书主要参考了《大正》《频伽》《金陵》《藏要》等版本，详细地从佛经中分别出对佛教外的印度各派哲学的不同描述，例如：关于数论的二十五谛，该书就列举了《成唯识论述记》（《大正藏》第 43 册）、《因明入正理论疏》（《大正藏》第 44 册）与《阿毗达磨俱舍论光记》（《金陵藏》第 45 卷）等三部书中所记的数论的关于二十五谛的论述。又如对各派哲学的综述中，该书列举了《梵网经》（《大正藏》第 11 册）与《阿毗达磨大毗婆娑论》（《大正藏》第 27 册）中关于六十二见的论述。^②

（3）关于印度的辞典或辞书：其中最重要的有玄应、慧苑、慧琳、希麟等所编的《一切经音义》（《大正藏》第 54 册）、《续一切经音义》（《大正藏》第 54 册）、隋吉藏著的《百论疏》（《大正藏》第 42 册），西藏在 9 世纪编的《翻译名义大集》等。这些辞书虽然为佛教所用，但也收集了许多关于印度别的宗教哲学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③

自佛教及婆罗门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在了解和接受佛教时，也即开始了对印度的研究，一千多年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许许多多的士大夫和僧人终生致力于解经格义、翻译注疏的学术活动，撰写了鸿篇巨制，给我们后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佛教文化遗产和极为珍贵的资料文献。在汉译佛经中有大量关于印度哲学的资料，遗憾的是由于佛教的势力太大，并没有人利用这些资料来对外道加以研究。

据史书记载，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是在公元 651 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实际上更早以前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之

① [日] 长部和雄：《唐宋密教史论考》，永田文昌堂 1982 年版。

② 汤用彤：《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③ 以上内容可以参考黄心川《印度教与中国》一文，见江亦丽著《商羯罗》序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7 年版。

间就互有往来。最早是在汉和帝刘肇永元九年（97）时，中国著名探险家甘英就曾奉命西使，游历过波斯等西域各国。以后还有不少中国和阿拉伯的船只和商人西往东来。到了盛唐时期，中阿关系更加发展，相互来往更加频繁。当时来中国的大食人（“大食”一词是阿拉伯语塔吉尔的音译，即商人之意）与日俱增。他们先是由海路，即从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到达广州、泉州等沿海一带城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后来又由陆路即经波斯、中亚、天山南北到达长安（今西安）。

唐至德二年（757），阿拉伯人应唐肃宗李亨的邀请，派军队前来帮助平定安禄山之乱。后来这些人留居在中国，成了中国穆斯林来源的一部分。唐（618—907）、宋（960—1279）两朝来中国经商的大食人更是络绎不绝。他们所经营的大多是香料、药材、珠宝等贵重物品。在来华的大食人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阿拉伯当局也曾多次派遣使节团来华。在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代，也就是公元651年8月25日（即教历31年1月21日），适逢唐永徽二年，他们向中国正式派来第一个使节团。他们谒见了唐朝皇帝并介绍了他们国家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多数史学家将这次使节团的来华作为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的标志。到了南宋末期，由于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相继又有大批被征服的伊斯兰教徒来到中国。在这些被征服者中有一个较大的民族叫作花刺子模，这些人后来成了回族的主要来源。蒙古灭南宋建立元朝（1271—1368）后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此时已有回、维等10个民族先后信仰了伊斯兰教。各地也随之建立了一些清真寺，如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亦称光塔寺）、西安的化觉寺，建于宋代的泉州清净寺和北京的牛街礼拜寺等。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佛教传入中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佛教传入中国后，立即受到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最高统治层中，信佛者、好佛者、捧佛者、崇佛者、媚佛者，代代有之。不少佛教徒，因其高深的宗教学识而被奉为“国师”、赐为“御弟”，冠带荣身，备受崇敬。伊斯兰教从唐代开始，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除新疆局部地区外，从未受到过最高统治者如此崇高的待遇。即使以元代而论，伊斯兰教的“答失蛮”所以在统治者的文书中能与儒释道相提并论，所受待遇较好，那主要是教因人贵，以穆斯林为主体的色目人社会地位较高的缘故。穆斯林以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杰出才干，为蒙古贵族统一中国、治理天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所以才被元统治者委以高官重任。这种委任与他们信